



KESHUODE YU BUKESHUOD
QIAN WEITEGENSITAN DE XINGERSHA

可说的与不可

前维特根斯坦的形而

鉴传今 ◇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KESHUODE YU BUKESHUOD
QIAN WEITEGENSITAN DE XINGERSHA

可说的与不可

前维特根斯坦的形而

鉴传今◇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可说的与不可说的：前维特根斯坦的形而上学 / 鉴传今著. —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81141-142-3

I. ①可… II. ①鉴… III. ①维特根斯坦, L.(1889 ~ 1951)—形而上学—研究
IV. ①B56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第 257272 号

可说的与不可说的 ——前维特根斯坦的形而上学 鉴传今 著

出 版 人：张传开
责任编辑：木 子
装帧设计：王 芳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 189 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芜湖新欣传媒有限公司

版 次：2010 年 12 月第 1 次修订

印 次：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700 × 1000 1/16

印 张：10

字 数：139 千

书 号：ISBN 978-7-81141-142-3

定 价：28.00 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写在前面

世界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如果抱定这样的想法，那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将一无所获，空手而归。因为他是这样一种哲学家：他只揭露我们的缺陷，而对应该如何生活之类的问题，却一直守口如瓶，秘而不宣。关于维特根斯坦的这个考察可能会遭致某种程度的非议，也可能使某些维特根斯坦爱好者感到不快甚至某种愤怒。其实就我自己而言，我也是一个真正的维特根斯坦爱好者，从过去到现在都是这样。尽管如此，但是，我仍然以为，严肃、理智地思考他，要远比单纯的爱好更加重要，也更有意义。

目 录

维特根斯坦：一个不断被复制的神话	(001)
第一章 《逻辑哲学论》的框架及主旨	(027)
第二章 语言·逻辑·哲学	(038)
一、语言问题	(038)
二、命题(一)	(041)
三、命题(二)	(046)
四、逻辑	(052)
五、语言批判	(057)
六、哲学	(062)
七、维特根斯坦与康德哲学	(074)
第三章 图象论	(079)
一、世界	(080)
二、对象	(086)
三、图象	(094)
四、命题是实在的图象	(105)
五、思想	(109)
六、关于“aRb”	(114)
第四章 神秘的东西	(119)
一、逻辑和形而上学	(119)
二、主体	(126)

三、神秘的东西的思想来源 (132)

四、神秘的东西 (146)

结 语 (153)

主要参考文献 (155)

维特根斯坦：一个不断被复制的神话

毫无疑问，它是戏剧和虚构对象、神话创作的好素材。
维特根斯坦对于我们来说是个极度现代感的外在者，一个
从来没有停止发挥自己、发现自身的挑战者。

——马乔里·坡洛夫 《维特根斯坦的梯子》

维特根斯坦可以变成我们想像的任何样子。

——爱德蒙兹和爱丁诺 《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

就职业和身份来说，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哲学家，在哲学圈里备受青睐。这是一个恒久不变的事实。然而，维特根斯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不仅是哲学的一个经久不衰的兴趣中心，而且也是哲学出版物以外的一个同样经久不衰的话题。据坡洛夫统计，大概有 8 种小说和戏剧、12 种诗集和 6 种左右的表演形式和实验艺术作品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维特根斯坦相关。他生前出版的著作很少，但留下了为数可观的笔记和谈话。这些东西通常都被视为天才之作。他的著作多由一些段落组成，结构奇特，文字简洁，但意义却不易把握。即便对于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来说，情况也大致如此。因此，维特根斯坦简直就是一个谜。对大多数人来说，他几乎是一个不可解的谜。这使他产生不少诱惑，同时也令人望而却步。自他出现以来，围绕他的争论和传说就没有间断过。这些争论和传说，不断复制，使“维特根斯坦”这个名字逐渐成为一个符号或一个神话故事。我们现在所能感受到的维特根斯坦的力量，一方面来自于他的著作，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关于他的神话故事。如果能够客观地看待这个事实的话，那么，我们恐怕得说，后

者的魅力要胜于前者。

在这个神话故事中，扑面而来而行为有些古怪的维特根斯坦超凡入圣具有了无数的光环：一个严肃、敏捷、痛苦、具有纯净理智的天才，一个僧人、神秘主义者和机械工的引人注目的结合，一个荒漠中靠面包、雨水和沉默过活的圣者。这些不同的描述中，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圣人、一个宗教人士、一个为人类受苦的圣徒。这就是那个神话中的维特根斯坦，它随时可以变成人们想像的任何样子。显而易见，在这个维特根斯坦身上，人们过多地倾注了一些情感。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人类情感自身的某种缺陷。事实上，在这种情感的漩涡及其缺陷中，以牛奶和面包为主，不穿制服，喜欢用粗俗的方式说出格言^①，经常绝望，喜欢阿加莎·克里斯蒂和美国侦探杂志^②，不时要去看一场美国西部电影的尖刻而难以与人相处的维特根斯坦^③，则

① 参见爱德蒙兹和爱丁诺合著的《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这部著作记载：“格奥尔格·克莱塞尔是奥地利出生的犹太人，供职于海事法庭，他是少数在维特根斯坦面前不感到胆怯、敬畏的人之一，克莱塞尔对维特根斯坦永不枯竭的格言的表达大为欣赏，比如：‘不要试图拉出比你的屁股还高的屎。’维特根斯坦把这样的话用在像波普尔那样可以改变世界的哲学家身上。”（爱德蒙兹和爱丁诺合著：《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方旭东等译，第13页，长春出版社，2003年版）

② 据称看电影是他的一种休息或工作方式。他说：“一部典型的美国电影，朴实的或无聊的，也许——不管它的无聊乃至它所用的手法——是有教益的。一部昏庸的、造作的英国电影不能给人任何教育。我常常从一部无聊的美国电影中学到知识。”（《文化与价值》，冯·赖特编，黄正东、唐少杰译，第8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侦探小说也是如此。恩格尔曼曾经说过，“他确实喜欢读好的侦探小说，同时认为读二流的哲学思考之作是浪费时间。”（参见爱德蒙兹和爱丁诺合著：《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方旭东等译，第174页，长春出版社，2003年版）

③ 维特根斯坦有一句格言：“当某人不喜欢你的时候要善待他，你需要的不仅仅是善良的天性，也需要表现得圆滑得体。”但他自己的为人与这句格言所要求的相距甚远，他连一般的礼貌客套都无法忍受。罗素说：“我记得有一次带他去参加亚里士多德学会的一个会议，在场的具有不同癖好的人，我都礼貌相待。当我们离开时，他竟暴跳如雷，斥责我没有对这些人说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蠢货，是道德的堕落。”（罗素：《罗素自传》第2卷，陈启伟译，第145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他的学生中，对他怀有恐惧感的不乏其人。即使是艾耶尔那样的人，想到在他面前讲话都有些情绪上的疑虑。他智力上的狂暴是人所共知的，但他也不乏身体上的狂暴。1937年，他在挪威隐居，他的邻居安娜·瑞伯尼——一位坚强的年长农妇——证实，他曾用木棍威胁她。他们原来很好的邻里关系于是变得一塌糊涂。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也是一如既往。当时，他住在贝文医生家。医生的妻子“曾对维特根斯坦搞过一次恶作剧，她告诉他，布罗德（罗素的学生，剑桥著名教授，维特根斯坦的同事，曾帮他获得教席，但二人关系不好——引者注）将顺便来访喝茶。当维特根斯坦发现真相时，他深为恼怒，两天拒绝与他的女主人说话。”（爱德蒙兹和爱丁诺合著：《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方旭东等译，第60页，长春出版社，2003年版）

成了一个模糊不清的幽灵。^①

这个“维特根斯坦神话”虽然有些趣味，但它自身不一定有多少真正的意义，但它的成因却未必没有意义。从形成上看，“维特根斯坦神话”是一大批精英的作品，它的力量是一种集体创作的结果。这一大批名人中，起很大作用的当然首推罗素。罗素 1911 年与维特根斯坦相识，他曾称这场相识是他一生中“最令人兴奋的智慧探险之一”。罗素和维特根斯坦曾是师徒，也是朋友。对于这个没有经过任何“哲学的科班训练”的学生，罗素到底给予了多少专业指导，维特根斯坦从来都没有说过，他只是在《逻辑哲学论》的序言中提到过罗素和弗雷格。^②关于这一点，罗素也没有说过，相反，他倒是明确承认，维特根斯坦的理论对他产生了“影响”（在《我的哲学的发展》一书中，罗素用了——一个章节的篇幅来讨论《逻辑哲学论》给他带来的那些影响。当然，在那里，他也写出了他对这部书的批评）^③。罗素带有某种鼓动性的权威说法是，维特根斯坦易动感情、思想深沉、性情激烈、卓尔不群，是“传统所说的天才的一个完满的实例”，除了摩尔以外，没谁能与之相

① 当然，关于维特根斯坦的另一面，近年来在艺术创作中也有所涉及。1993 年，著名导演德雷克·贾曼出品了名为《维特根斯坦》的传记片。以维特根斯坦少年、青年、老年时的一些生活片断为素材，展示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和思想，在公众中有比较强烈的反响，在维特根斯坦研究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片中出现绿毛怪、短发裸女、土著人等等令人惊异的形象，有浓厚的魔幻色彩，这本是当今世界电影市场上那股魔幻浪潮的折射，但贾曼却认为那是维特根斯坦所思所想的一种形象化展示。影片中有一个非常生动、深刻、含义丰富的场景：一大群成年人围住少年维特根斯坦唧唧喳喳，作为维特根斯坦纯净的精神家园屡遭世俗世界入侵的隐喻，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在贾曼的影片中，维特根斯坦被描绘成一个思想家，一个直觉的、情绪化的、骄傲的天才和一个同性恋者（据说，维特根斯坦家族对同性恋并不陌生。他的传记作者威廉·巴特利[William Warren Bartley]曾说，他家族的五兄弟中，就有三个同性恋者。稍有不同的是——像影片中所表现的那样——维特根斯坦是一个事后总感到不安、羞愧而又进行反省和自责的同性恋者）。不知道是一种严肃探究，还是一种纯粹的商业运作。尤其考虑到电影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就已基本堕落这一事实，对这部影片所可能产生的影响要更加提高警惕。我们之所以对关于维特根斯坦的一部电影费这么多口舌，其原因在于：这种“贾曼方式”已经成为当今学术界一种并非罕见的现象。

② 维特根斯坦的原话是这样的：“我只想提到，对我思想的激励大都得之于弗雷格的伟著和我的朋友罗素先生的著作。”（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陈启伟译，载涂纪亮主编《维特根斯坦全集》第 1 卷，第 187 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年）我们知道，维特根斯坦是以旁听生的资格进入剑桥受教于罗素门下的，但从这段话的语气来看，他好像没有当过罗素的学生，相反，从一开始他好像就是个哲学家，或至少也是个哲学研究者。

③ [英]罗素：《我的哲学的发展》，温锡增译，第 98～113 页，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

比。^①罗素是那种具有诗人和小说家气质的思想家,他以诗人的情怀和小说家的方式讲过不少关于他的故事。这些故事散见于罗素的著作、谈话和书信中,被一些传记和各类出版物作为素材,不断复制,推动了“维特根斯坦神话”的传播。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次,在维特根斯坦进入剑桥的第一学期期末,他跑到罗素那里,情绪激动,并有些异常。罗素早已对此习以为常。因为,维特根斯坦经常深更半夜跑到罗素那里,在他的书房里来回踱步,几近疯狂而处于崩溃的边缘。以至于罗素担心,他要打碎房间里的家具。这一回,维特根斯坦强烈要求罗素确定他自己是不是一个十足的笨蛋。罗素没太明白这个问题的原因。维特根斯坦说:如果我是,我就做一个飞行员;如果我不是,我要成为一个哲学家。于是,罗素以惯常的敏捷告诉他,那他得写一篇论文,然后才能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十足的笨蛋。新学期开始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就拿来一篇论文。罗素说,他刚看了第一句,就相信维特根斯坦是个天才!^②罗素此言的力量以及它在一般人的心灵深处所能产生的震撼是不言而喻的。这个故事,充分反映了罗素的机智和诗情,它广为流行。对维特根斯坦来说,这个故事的流行及其影响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甚至要超过他本人的学说所能产生的效果。

那个时候,他们两人的关系很好,只是到了后来才出现了一些摩擦。维特根斯坦对罗素时有轻蔑^③甚至攻击^④,而罗素则没有多少过激的反映,而大多是在有限的范围内保持着一种学术的冷静。在《我的

① 参见罗素:《罗素自传》第2卷,陈启伟译,第145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② 参见罗素:《罗素自传》第2卷,陈启伟译,第146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③ “英国风度对维特根斯坦是陌生的,他当面表达许多关于罗素大胆直率的评论,这些包括一战以来对罗素哲学著作较低的评价。一封1919年他在战俘营中的书信给了这样风格的例子,维特根斯坦刚读了一册罗素的最近著作《数理哲学介绍》,而他的《导论》(即《逻辑哲学论》——引者注)还处在冷宫,‘这真令人郁闷,’他写道,‘使一本完成了的著作处于禁闭状态而无价值的书却大行其道。’”(见爱德蒙兹和爱丁诺合著:《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方旭东等译,第42页,长春出版社,2003年版)

④ “对维特根斯坦来说,他到1946年就不再相信罗素能写一流的著作了。在道德科学俱乐部与波普尔见面后几个星期,维特根斯坦给摩尔写了封信:‘不幸的是(我相信),罗素在场,而且令人厌恶。油腔滑调而肤浅,尽管像往常一样惊人地敏捷。’这可能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其后,维特根斯坦告诉美国哲学伯沃斯曼(Bouwsma),他们‘碰面但不说话。’”(见爱德蒙兹和爱丁诺合著:《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方旭东等译,第44页,长春出版社,2003年版)

哲学的发展》中,罗素再度批评《逻辑哲学论》时,也流露出一些不满。在指出维特根斯坦命题理论中的某种神秘倾向之后,罗素说:“他和往常一样,是独断的,他吐露他的意见像沙皇下谕旨一样。但是草野小民对这种办法是难以满意的。”^①显而易见,在这段批评中,罗素掺杂了一些情绪,但这充其量也只能算作一种无伤大雅的抱怨,与维特根斯坦那些激烈、尖刻的言辞不可同日而语。

在“维特根斯坦神话”的形成中,名人及其作用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如果没有他们,没有他们那些无论谨慎还是轻率的言辞,维特根斯坦如果留在历史中,那非常可能是另外一种形象,比如“一个怪物”,或与此相关的形象,等等。其实,在任何事情中,情形都是一样。有一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种状况。“跨过卢比肯河”(cross the Rubicon)是一句广为流传的谚语,其意思是说:下定决心要去完成一件事,义无反顾地做某事。它所依据的历史事件,我们并不陌生:公元前49年的某一天,恺撒率领一个军团的兵力跨过意大利与高卢诸省交界的这条小河,打回罗马,建立了他的独裁政权。然而,问题不在于此,问题在于:在公元前49年的那一天,跨过卢比肯河的不止恺撒一个人,肯定还有很多人,但只有恺撒“跨过卢比肯河”才成为一个历史事件,才具有不止一个方面的意义。因此,就事件的构成来说,名人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事情就是那样发生的,悲伤或愤怒都无济于事。在“维特根斯坦神话”的例子中,“名人效应”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因素。

除了“名人效应”之外,“维特根斯坦神话”则和他自身的行为方式(包括话语方式)相关。他的一生可谓丰富多彩,但他自己没有留下自传之类的东西,也没有为他的思想进行过申辩。也许他认为,自传和申辩,那是一种庸俗无聊的做法,不仅毫无必要,相反会失去骄傲的品格,降低本来已经很高的水准。可以说,他是那种做得多而说得少或只做不说的人。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他的一些行为就引起了许多非常不同的解释,而行为本身自然带上了某种神秘色彩。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同时,他又是一个充满强烈痛苦的人。这是他给一般人留下的

^① [英]罗素:《我的哲学的发展》,温锡增译,第106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总体印象。而他的亲友也是这样看待他。对于维特根斯坦的这种特异性及其不同寻常的痛苦,赫尔曼,他的大姐,曾有过精彩的描述。她“认为他拥有穿透事物心脏的思想,能够‘用同一种方式抓住一段音乐或一件雕塑、一本书、一个人、甚至偶尔——尽管听起来很奇特——一件女装的本质特征。’当贝凡太太(即贝文太太,维特根斯坦的朋友贝文医生的太太。在他们家里,维特根斯坦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光。这件事发生在他去世前——引者注)被邀参加在三一学院为国王乔治六世与女王伊丽莎白举行的招待会,维特根斯坦看到她的外套时,他的脸变得难看起来,于是取了一把剪刀,快速剪掉了两个纽扣。结束操作后,她说,看起来更优雅些。赫尔曼观察到,在任何不适宜的环境中,他都会遭受‘几乎病态的痛苦’。”^①

对于维特根斯坦的这种特异性,罗素也作过生动描述。他在《罗素自传》中写道:“怀特海曾向我讲过维特根斯坦第一次去见他的情形。那是午后吃茶点的时候,他被请进客厅。他好像就没有发觉怀特海夫人在场,而是沉默不语,在房间来来回回地走了一会儿,最后突然迸出一句话来:‘一个命题有两极,它是 aRb 。’怀特海给我讲述时说:‘我当然问他 a 和 b 是什么,但是我发现我的话说得很不得当。’‘ a 和 b 是不可定义的’,维特根斯坦回答道,其声大如雷鸣。”^②

与此类似的记述很多,它们确实展示了维特根斯坦的一些突出特点,但是仅凭这些还不足以了解维特根斯坦。那么,维特根斯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从各种直接和间接的关于他的记述中,我们知道:他是维也纳的一个富家子弟,一个哲学上的天才,在有生之年,他开创了两种截然相反但都影响巨大的哲学。但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制造过一台简单实用的缝纫机(那时他年仅 10 岁),设计过飞机螺旋桨,建造过房屋(为他的一个姐姐设计建造,至今还是维也纳的一处景观。这个建筑令维特根斯坦感到骄傲。在后来的一则札记中,他写道:“我为格蕾特尔建造的房子是极其灵敏的耳朵和良好的风度的产

① [英] 爱德蒙兹和爱丁诺合著:《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方旭东等译,第 177 页,长春出版社,2003 年版。

② [英] 罗素:《罗素自传》第 2 卷,陈启伟译,第 148 页,商务印书馆,2003 年版。

物,是[对一种文化等的]高度理解的表现。”^①),有良好的音乐天赋,擅长吹口哨,达到登台演出的专业水平。《文化与价值》这部著作中,有很多条札记是对音乐进行的评论,体现出他对音乐具有良好的天赋和精深的理解。维特根斯坦最初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工程师。1906年,他到柏林学习机械工程。1908年,他去了英国,在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大学攻读航空工程空气动力学学位。在这个时候,为了弄清螺旋桨的原理,也同时出于对数学基础的兴趣,他读了罗素与怀特海合作的《数学原理》,还读了戈特洛布·弗雷格的《算术基础》。在1911年夏天,他去耶拿拜访了弗雷格,想跟这位逻辑学大师学习,但这位逻辑学家给他推荐了罗素,也就在这一年,他到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问学于罗素门下。他在三一学院注册的是旁听生。一战爆发时,他作为志愿兵从军(按规定,他本来可以免除兵役),在东部的战壕里完成了《逻辑哲学论》(有种说法是,他在那之前就写出了这部天才著作的初稿,只是他把它带到了战场上),后来,他成了战俘,囚禁在意大利的某个地方。在罗素的帮助下,他出版了《逻辑哲学论》,认为所有哲学问题都已解决,于是离开哲学,到奥地利南部山区当了一名小学教师,他在那里除因体罚学生而与家长冲突外^②,唯一的成果是编纂了

① [英]维特根斯坦:《文化与价值》,冯·赖特编,黄正东、唐少杰译,第54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② 那正是格律克尔倡导奥地利学校改革运动的时期。尽管维特根斯坦认为这个计划的口号和方案“比较粗俗”,但他还是“以贵族的热忱”投入了这场改革。他于1919年12月进入维也纳的一所师范学校接受教师培训,次年7月获得教师证书,9月即到奥地利南部山区偏远的特拉腾巴赫村担任小学老师。有不少人以为,一个百万富翁去当乡村教师的确是一件反常的事。他4年的小学老师生涯中有两个突出事件,一是编写《小学生字典》,二是体罚学生。当时的一位学生证实,“他在体罚学生方面从不迟疑——有时使他们的头或耳出血”。(见爱德蒙兹和爱丁诺合著:《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方旭东等译,第179页,长春出版社,2003年版)30年代,维特根斯坦曾对此进行过忏悔,他的说法是“用掌轻拍学生的头”之类。当地的学生家长称他为“疯狂的家伙”,他认为他们都是些“粗俗愚蠢的南部农民”。他坚信:特拉腾巴赫的人是卑劣的。在与罗素的通信中,他坚持这个意见。罗素在其自传中讲到这件事:“他曾给我写信说:‘特拉顿巴赫(即上文之‘特拉腾巴赫’——引者注)人很坏。’我曾回答说:‘是的,所有的人都是很坏的。’他也曾回答说:‘不错,但是特拉顿巴赫人比别处的人更坏。’我回答说,我的逻辑感反对这样一种说法。但是他的这个意见是有某种理由的。农民拒绝供给他牛奶,因为他教他们的孩子做的算术题不是计算钱数的。这段时间他一定很受了些饥寒穷困之苦,但是由于极端的高傲,他对此很少提及。”(罗素:《罗素自传》第2卷,陈启伟译,第148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一本《小学生字典》(有的研究者把这本字典视为他语言哲学实践上的一个收获,这真是一个大胆而奇怪的想法)。最后,他结束了小学教师生涯,到一所修道院里为一名园丁作助手。很快,他放弃了助手工作,去做建筑师,为他的姐姐设计建造宅第。这是一座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后来成为保加利亚使馆(维也纳1933年—1938年的地方志,都把他称为一名建筑学家)。也是在这个时候,被称为“维也纳小组”的那群逻辑实证主义者正在“一句一句地”读他的《逻辑哲学论》(这本不足两万个单词“小册子”,足足耗费了他们一年的光阴),把他奉若神明。而他们原先的精神导师——罗素,相形之下,都显得黯然失色。^①他和这个小组有过一些对话。后来,小组成员魏斯曼将这些对话整理成册,以《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小组》为题出版。虽然倍受尊崇,但维特根斯坦以为,他们没能理解他(他有一次对卡尔纳普作出这样的评论:如果他不能嗅出味道,我也爱莫能助,他就是没鼻子。)但剽窃了他,而最终反目。^②1929年,维特根斯坦回到剑桥,以《逻辑哲学论》作为论文申请博士学位,答辩由他过去的老师罗素和摩尔主持,他在陈述完毕以后便斥责这两位老师不懂他所谓的“真正的哲学”。他获得学位后,留在三一学院教授哲学。1939年,他接替摩尔成为哲学教授。他对剑桥并不满意,认为那是一处“吵吵闹闹的妓院”、“一块哲学的沙漠”,并坚信“哲学教授”是“一份荒唐的工作”,他从剑桥这

① 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师徒都是“维也纳小组”热烈崇拜的人物,但罗素对他们产生影响的时间要早于维特根斯坦。“鲁道夫·卡尔纳普与汉斯·汉恩是仅有的那帮能够宣布已经消化出版于1910—1913年的罗素的《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的人中的两个。卡尔纳普,当他还是1920年代早期高通胀的德国的不名一文的研究生时,已写信给罗素要一册不易买到的——或负担不起的——1929页三卷本大部头著作。罗素回信达35页详细解释了它的所有证据。”(见爱德蒙兹和爱丁诺合著:《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方旭东等译,第131页,长春出版社,2003年版)但“维特根斯坦是他们抱以最大尊敬的人。1933年2月,A·J·艾耶尔写信给他的朋友以赛亚·伯林,提到他对小组的印象:‘维特根斯坦对他们所有的人来说是一尊神。’而罗素,据艾耶尔观察,仅仅被视为‘上帝(维特根斯坦)的先驱’。”(同上,第132页。)

② “随着卡尔纳普的杰作《世界的逻辑结构》(Der Logische Aufbau der Welt)的出版,最后的破裂发生了。维特根斯坦控告卡尔纳普剽窃——一种他一直在留意的罪行。而且他相信,根据卡尔纳普在书中对他的致谢,这个罪行在此例中实际上已经成立。维特根斯坦的反应是,‘我不在乎一个小男孩偷我的苹果,但我在乎他说我把苹果给了他。’”(见爱德蒙兹和爱丁诺合著:《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方旭东等译,第138—139页,长春出版社,2003年版)

个“流感区”辞职。那是1947年。4年后，他在贝文医生家去世。他去世的前两天还在进行哲学研究。他得的病是前列腺癌。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①这个句子简洁清晰，不容置疑，听上去像是一道谕旨，意味深长而又传达着某种神秘，放在《逻辑哲学论》里面，一点都不会逊色。

这个“履历表”大致是维特根斯坦一生的记录。从这个记录中，我们知道了关于他的一些事件，但是我们却很难说对他究竟能有什么样的了解。他的生活，像他的著作一样，由一个个片断联结而成，它们各自独立，彼此之间似乎缺乏一种必要的关联。他就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对于真正了解他来说，确实有很多困难，但对于神话创作来说，这却是很好的素材。从上述的履历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一个人的维特根斯坦，有一些十分突出的特点：他是一个行动者。这与他的老师罗素不同。在漫长的一生中，罗素不仅回复了任何一封写给他的信，而且还写下了大量的文字，描述自己的生活，解释自己的思想，展示自己的情感，对自己的思想和别人的思想都进行过详细的评论。不仅如此，罗素还对众多的公共事务公开表达过意见。他思想丰富、深刻、尖锐而又敏捷，喜欢辩论，80岁时再度入狱。那是1946年，原因是支持一项公民不服从政策。罗素晚年坚决反对核武器，他把支持这项政策视为他反对核武器运动的一个部分。他的晚年还有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他对越南战争公开而激烈的批评，曾引起执政当局巨大的焦虑和愤怒。维特根斯坦则完全不是这样。在他的著作中，虽然我们有时也可以读到一些解释性的文字，但从上下文来看，那些文字与其说是一种解释，不如说是他的思想。可以说，他只是把他思想的过程

① 关于他最后的时刻，他的一个学生——诺尔曼·马尔康姆——满含深情地写道：“四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下午他去散了一会步。那天夜里他病得非常严重，他仍然是清醒的。当医生告诉他只能活不多的几天时，他叹息说，‘好的！’在他失去知觉以前，他对贝文夫人（那一整夜她都在看护他）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为美好的一生！’他说的‘他们’显然是指他的那些亲密朋友。当我想到他的深刻的悲观主义，想到他精神上 and 道德上遭受的强烈痛苦，想到他无情地驱使自己的心智，想到他需要爱而他的苛刻生硬又排斥了爱，我总认为他的一生是非常不幸的。然而在临终时他自己竟呼喊说它是‘极为美好的’！对我来说这是神秘莫测而且感人至深的言语。”（[美]诺尔曼·马尔康姆：《回忆维特根斯坦》，李步楼、贺绍甲译，第90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展示出来,而不是什么对于他思想的一种解释。在现代思想中,诠释和“过度诠释”已经成为一个毒瘤,一种痼疾,一种旷日持久而肆虐无忌的瘟疫。尽管如此,但是,拒绝解释或阐释,未必是一种值得赞赏或推荐的方式。在他的著作中,他是一个思想者;在他的生活中,他是一个行动者。

如何看待行动者维特根斯坦?他一生经历的事情可真是不少,与他同时的所有重大事件,他几乎都迅速地作出了反映,不仅如此,他还积极地投身其中。一战中,他成为军人。奥地利教育改革中,他成为一名小学教师。他对苏联怀有某种情感,曾打算到那里定居。二战爆发时,他已届“知天命”之年,但他仍以独特的方式参战,去伦敦的一家医院当看护,在那里度过了战争的大部分时间。后来他又去一个医疗队当实验助手,“研究伤兵休克疗法,他设计了一种新的仪器,能够通过血压的变化测量呼吸的变化”。^①但是,所有这些都只是一些单纯的事件,都几乎没有任何社会影响,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没有留下痕迹,用他后期的话说,都像是某种“私人语言”,使人难以发现它们本来应当具有的意义。好像他只是个行动者,他关注的似乎只是行动本身,至于事件的意义,则是无须赘言的。如果用《逻辑哲学论》的方式表达,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事情就是那样,它就是那样发生的,它的全部意义就是它是那样发生的。这些事件,由于缺乏与社会历史进程的关联,由于缺乏明确的价值立场的烛照,都像他生命河流中的孤岛,每一个都很生动,但整体上却难以发现其深刻、伟大的意义。维特根斯坦做事的动机总是比较奇特。我们知道,他曾积极地参加一战,并成为一名军官,还因良好的指挥才能博得赞扬。罗素把这件事看作一种爱国行为。不知道维特根斯坦会不会同意罗素的意见,因为有一种说法说他参加一战是为了“体面地自杀”。这真是常人无法理解、也无法想像的一种行为方式。在这一方面,他与罗素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除了哲学研究之外,罗素对社会问题的强烈关注,对自由和正义孜孜不倦、百折不挠的追求,往往使他的单个行为远远超出了事情

^① [英]爱德蒙兹和爱丁诺合著:《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方旭东等译,第21页,长春出版社,2003年版。

本身的限制，成为社会历史中涵义丰富的事件。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维特根斯坦对罗素这种方式是决不赞同的。来自恩格尔曼的一条材料可以证实这一点。“保尔·恩格尔曼记录说：‘维特根斯坦把服役看成是他压倒一切的义务，当他听到他的朋友罗素作为反战人物进入牢房，他公开表示对罗素勇气的尊重，但他还是感到这是把英雄主义用错了地方。’”^①这则记录透露出他与罗素的明显区别，这可能涉及到行动、意义和价值这些十分重大的问题。但应当把英雄主义用在哪儿（即应当如何行动，如何评价某个行动、行为及其意义，这是人的生活、人的生命的重大问题之一）才算用对了地方，维特根斯坦没有说，我们也无法推测。当然，有人可能会对此表示反对，以为这越出了学术之外，是一种过分的要求。哲学家的本业就是研究哲学，不能把哲学家的生活或他的品行与他的学术联系起来。哲学家的生活或为人是一回事，他的学术又是一回事。因为休谟曾经说过，关在房间里研究哲学与从那间屋子里出来与朋友们喝酒、聊天和打打牌，本来就是两桩不同的事情。无独有偶，叔本华也说过，我的生活和我的学说是两码事。因此，他在强烈主张别人限制欲望的同时而放纵自己的欲望。不仅如此，而且哲学家也是常人中的一员，他研究哲学，但也像常人那样生活。不应当非要把他的行动或行为与社会历史关联在一起。他为社会提供某种学说或思想，社会不应当对他提出过多的要求。对于哲学家来说，社会所要做的就是接纳他。维特根斯坦有可能同意这种意见。《逻辑哲学论》在寻求出版的过程中遭遇到一些困难，出版商曾要求维特根斯坦支付与印刷相关的费用。维特根斯坦觉得受到了侮辱，因为在他看来，作者完成某部著作而自费出版，是一件极端不正派的行为。他曾自负而不无愤懑地表述过下述观点：我的工作写书，而世界必须以正当的方式接纳它。这话是不错的。然而，问题在于：什么是正当的方式呢？换句话说，世界为什么要去接纳一位作者的著作呢？这里面隐含着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作者必须对世界负有一种责任，这是世界接纳他的一个必须的前提。如果单方面对世界提

^① [英] 爱德蒙兹和爱丁诺合著：《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方旭东等译，第77页，长春出版社，2003年版。